

第
五
十
辑

老照片

我们的初中生活(下) 叶维丽 马笑冬
1932年：中国掠影 张远航
山色不随春老 谢声显
属羊的二姑姑 熊景明
边寨旧事 朱新地
历史照片的美学追求与深度开发 秦 风
廖初江浮沉录 叶之翔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

三

三



曾经战火的传令兵（摄于1937年）

孙明经 摄影

1936年11月，傅作义部发起百灵庙战役，围袭日军傀儡德王之第七师，获大胜。事隔半年，这位有着标准军人面孔的传令兵，说起当时的战斗仍滔滔不绝。时在绥远考察的摄影家孙明经，以弹痕累累的军车为背景，给他照了这张像。



南京的一个教师之家（摄于1934年）

郑 晔 供稿

照片上的男主人叫郑君平，是南京中英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，女主人叫张衡英，在一所小学当老师。怀抱里是他们的长女郑彬彬，刚满“百岁”。后来，他们又陆续生了七个孩子。男主人1957年突发脑溢血，倒在东北一所大学的讲台上。女主人卒于1988年。怀抱里的女孩，后来成为一名卓有建树的中医大夫，今亦儿孙满堂。

目 录

叶维丽 马笑冬	我们的初中生活（下）	1
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

两位“老三届”女生，对自己当年接受“革命化”教育的回忆与反思……

张远航	1932年：中国掠影	20
-----	------------	----

1930年代，一幅幅当年中国的真实写照。透过人们脸上的苦闷、从容和微笑，可以看到中国的灾难与希望……

宗鸣安	西安忆往：曾经的“激情岁月”	39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谢声显	山色不随春老	44
-----	--------	----

几十年来，不管遭遇多么沉重的打击，我从未见过姐姐流泪。这让我想起一位西方古典诗人的话：你若聪明，就应快乐……

熊景明	属羊的二姑姑	55
-----	--------	----

齐晓芳	童年照片的背后	63
-----	---------	----

李 强	三十年前的“教育改革”	68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朱新地	边寨旧事	72
-----	------	----

“迎着晨风，迎着阳光，跨山过水到边疆！”一位当年的女知青对如烟往事的点滴回忆……

张凤杰	没有老师参加的毕业照	82
-----	------------	----

史耀增	难忘当年育人人	85
-----	---------	----

秦 风	历史照片的美学追求与深度开发	89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历史照片的美学追求是中国人新的文化课题，它涉及民族的美学教育与公共知识的传

老照片

播，如何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……

冠 珍	天下谁人还识君·····	106
叶之翔	廖初江浮沉录·····	111
鲁礼安	父亲，深圳往事·····	115
姜梦梅	怀念母亲·····	132
梁克隆	赋得永久的爱·····	141
秦 风	“中华民国总统、副总统就任摄影” 人物考证·····	149
郭建良	曾经赛诗·····	151
阮 刚	读《幸福，被地震埋葬》有感·····	153
冯克力	又到秋风飘叶时·····	155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出 版 人

刘传喜

执行主编

冯克力

执行编辑

张 杰

特邀编辑

丁 东

邵 建

美术编辑

王 芳

技术编辑

张 涛

封二 曾经战火的传令兵（孙明经） 中插 胡
宗南部占领延安时期的影像（秦风） 封三 南
京的一个教师之家（郑晔）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，须经本社同意。

·人生况味·

我们的初中生活（下）

叶维丽 马笑冬

马：对上中学后发生的另一个变化，我的感觉就深多了，那就是开始了下乡劳动，一年两次，一次秋收，一次夏收。你们也去吧？

叶：去，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，那时我们十四岁。听说在我们之前，女附中的学生劳动都是去摘草莓，听起来像是去郊游。从我们开始，是真正参加农业劳动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是去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参加秋收，大概是两个星期。头一次在农村生活，水土不服，浑身长疙瘩。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经受锻炼，劳动改造思想，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，所以总是在收割的季节去，干最累的活儿。我们班有的同学干活真是不怕苦不怕累，割麦子时镰刀磨得满手都是血泡，她们就会受到表扬。说起干活不怕苦，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有一年秋天我们下乡割稻子，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，我们管她们班叫“姐姐班”，这是女附中的叫法。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太高的人，她干起活儿来动作特别快，一刻都不停，浑身衣服都被汗浸透了，运稻子的时候她手里多得拿不住了就用衣服兜着，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，用手使劲拽着衣角，肉都露出来了，她却毫不在意。我忘了自己干活，光看着她，直为她累，干嘛要这么个干法？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。

马：你们怎么知道？

叶：当然是姐姐班里的人告诉我们的。她不说笑，就是干



图① 1960年代末，叶维丽与家人在北京。

活，像个苦行僧，我当时觉得她有点儿可怜。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，但她即使这样干活，也没有听说她受表扬。我干活从来受不到表扬。别看我个子高，干活老落在后面。即使这样，我每次下乡劳动结束回到家里，常常累得过了好多天腿还伸不直。

马：有人用“腿肚子朝前”来形容累的程度，大概你就是那种情况。我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下乡帮助农民收麦子，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我们的吃苦精神，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。近傍晚开始走，一百里路，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。半夜下了大雨，淋得像个落汤鸡。我知道有的同学来例假，卫生纸上的血被大雨都泡白了。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，咬牙坚持下来了。可是一到家，我就昏睡了一整天，我睡在爸爸妈妈的床上，他们的床大，

是席梦思的。快傍晚的时候，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。起来之后，我就夸张地一瘸一拐地走，好让妈妈疼我。我最想念的就是我妈妈的手擀面，一大碗香喷喷的荷包鸡蛋面，我永远忘不了。

叶：你一回家就撒娇。我们家没有席梦思床，下乡劳动回来睡到自己的木板床上舒心的感觉我也记得。在农村是睡土炕，大家挤在一条炕上。

马：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，我连衣服都没换。劳动了那么长时间回到家里总该洗个澡换个衣服吧，这太人之常情了，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该换衣服。我觉得如果我换衣服，就说明我认为劳动是脏的，说明我厌恶劳动。我妈妈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？”我说：“干嘛呀，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，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，我不是还不洗吗？为什么一进城就要换？”第二天我到学校，还穿着我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，上边有大补丁。可是一到学校我就傻眼了，所有的人都换上干净衣服，就我一个没换。我这时才想，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……

叶：你真够革命的。我对下乡劳动还有个印象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强调阶级斗争了。

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，校长讲的别的话我都忘了，但有一件记住了，就是她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，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。

马：对，那时是这样说的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？当时已经有这个阶级观念了。

叶：毛泽东当时发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号召，“革命化”的过程也是逐步绷紧阶级斗争弦的过程。那时一天到晚在讲“反修防修”，给十几岁的孩子造成一种革命事业危机了的感觉。又是美帝，又是苏修，又是国内的阶级敌人，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。当时有出戏叫《夺印》，里面有个地主婆叫“烂菜花”，企图腐



图② 马笑冬在文艺宣传队跳“革命芭蕾舞”。

蚀村干部何支书，给他做了一碗元宵，有个很长的唱段是唱这元宵有多好吃。

马：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？真是滑稽。现在的干部哪里看得上？

叶：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，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，但从小就知道地主富农不好。听了校长的话，心里很紧张，也很害怕。记的有一次在一个村里劳动，吃完晚饭天很黑了，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，在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，模模糊糊地看不清。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蹲着的人悄声说：“他可能是个地主。”好像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。当时听了就有点儿害怕。

马：觉得他蹲在那儿就有点儿不对劲？

叶：是。后来插队了才知道，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。我们插队的地方管蹲着叫“圪蹴”，下了工吃了饭，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，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。

马：咱们那时候一点儿不了解农民。

叶：一讲阶级斗争，到处都是阶级敌人，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，对年纪大的不能称呼“大伯大爷”。小的时候受的那种对人要有礼貌的教育在这儿就行不通了，这又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。我们在农村除了干活和村里老乡没有多少接触，谁知道村里是什么情况。

马：我对讲阶级斗争也有印象。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讨论，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，你不知道他的成份救不救？你救的人万一是一个地主，而你为了他牺牲了自己，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好人死了，换来一个地主的生命，这怎么办？

叶：你们的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，是一个只有在那种形势下才会出现的讨论。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？该不该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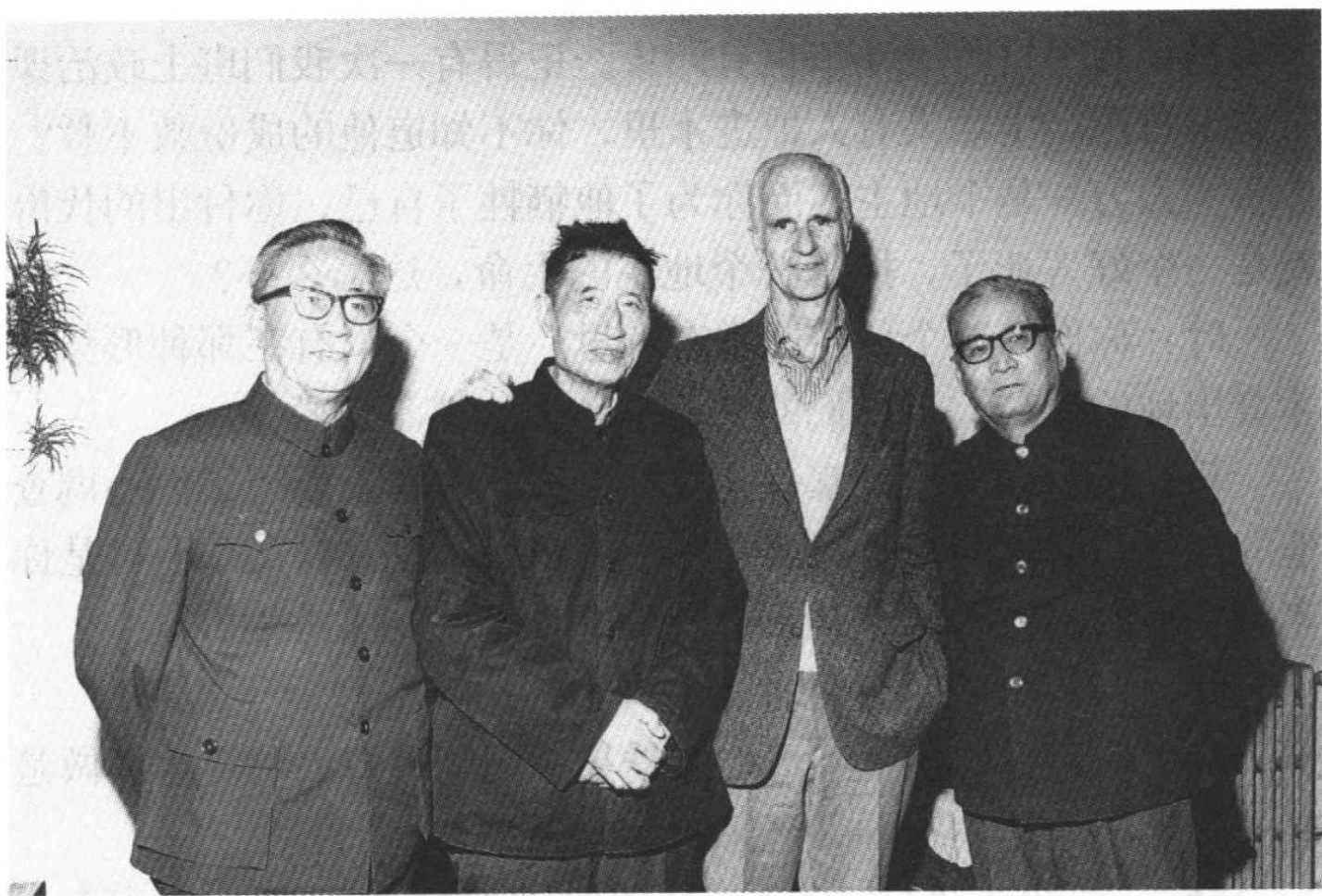
马：没有结论。大家争论说如果一个人马上就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份，就来不及了，那舍己救人就根本没有意义了；可是你不调查他的成份的话，如果你救的是个地主怎么办呢？

叶：你们转来转去在兜圈子。

马：这种讨论根本不可能有结果，因为没有人敢说这样做是对的，那样做是不对的，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叶：这样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，都还没有提出来，至少我们小孩儿不会想到这个问题。那时候就是强调做好事，帮助人，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，并没有说要问问被帮助的人是什么出身，什么阶级成份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雷锋的“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”已经埋下了伏笔。你们这种讨论其实是给“文革”做准备。到了“文革”，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，打死也是死有余辜。

马：我们好像只知道有阶级性，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。我当时对克服所谓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还是有点困难。记得当时上演电影《早春二月》和《舞台姐妹》，我很喜欢。可在革命化期间，这些电影都被批判了，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？大概像多愁善感、软弱、动摇等等都算吧。《早春二月》里有一个情节，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免于一个年轻寡妇陷入厄运，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，和这个寡妇结婚，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，我不明白这种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，但我自觉地纠正自己，努力向革命化靠拢。



图③ 1980年代初，叶维丽的父亲（左一）和伯父叶笃义、叶笃庄与美国友人在北京。

叶：这个革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咱们早年教育否定的过程。咱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是有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的，民间故事、外国童话、古典诗词，各种成份都有一些，并没有和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完全隔绝，你内心有冲突也说明这一点。在革命化的过程中你在努力靠拢“革命”，批判自己的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，而我恰恰在这个革命化不断加速、大部分人都往前赶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疏离，感到不合拍，同时也开始感到痛苦。

马：你怎么感到疏离？

叶：对那些越来越革命的说法我总有一些怀疑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里劳动，抬很重的黄土垫操场。我跟一个同学前后担着一个大筐，来回走了好几趟，越走越沉。走着走着，这个同学突然停了下来，说：“我刚才想到一句毛主席的语录，突然就觉得担子轻了。”我的反应就是一种不相信的“是吗”？当然没敢说出

来。

马：我想那个同学说的可能是真的。

叶：她可能是真信。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学毛选，毛的话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，人们行为的指南，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说法也越来越多了，好像有了毛的思想武装，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。

马：是的，那时候毛的权威越来越被神化，报纸上充满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。对你的同学的说法我就不会怀疑。你还能这样真不容易，我是整个地投入进去了。

叶：我不可能一点儿没进去，周围那么一个大环境，但就是开始觉得有点儿格格不入。你刚才提到电影《舞台姐妹》，我也看了。里面有一句话，“清清白白地做人，认认真真地唱戏”，我当时一听就想，这两句话怎么说得那么好啊？

马：真的？！我那时候一定会批判这句话。这种话一点儿也吸引不了我，到现在也吸引不了我。

叶：这句话马上吸引了我。那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这句话，但不敢告诉别人我喜欢一个受批判的电影里的话。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能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，他好像是新华社的一个年轻干部，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，和当时革命化的形势特别不协调，我就注意他，到现在还记得他的神情，我想他是很吸引我的。这种思想要在革命化中暴露可真是“不健康”，所以我也不暴露。

马：要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讲，他这样的就是“多余的人”。

叶：大概我自己也正成为“多余的人”。我知道在“文革”前那种政治气氛下，我的想法很可怕。革命化的时候我就批判我自己，可是那些想法照样有，我没有办法相信那些离谱的革命高调，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是没道理的。我越来越感到疏离，而疏离的感觉又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，从十几岁开始我就觉

得自己是革命的对象，老觉得改造自己，这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。我内心开始有一种痛苦，这是小时候从未有过的感觉。我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。我的一个老师居然找我谈话，说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，不像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，我心想都被看出来来了，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觉得我“有问题”，“团组织”也发觉了。

马：那是怎么回事？

叶：我成了我们班干部子弟中极少数到了年龄没有入团的人，而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，入团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。到十五岁就可以入团吧？我们班干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满了十五岁就会入团。你是什么时候入团的？

马：我是十五岁生日那天入的团。可我们学校没有干部子弟一到年龄就入团的规矩，这是太明显的特殊化了。

叶：我们也没有这样一个明文规定，可情况就是这样的，不管是多不起眼的同学，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，满了十五岁就入团。我们班是谁入团了，团组织就在黑板上宣布，恭喜谁谁入团了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到了1966年春天，我们班最小的同学都满了十五岁，整个班上的干部子弟差不多都入了团。到了黑板上宣布那个最小的同学入团的时候，我就明白我被甩了。

马：被甩了？

叶：被革命的“列车”甩了。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她说我看到黑板上那一行字时，脸马上红了。我表面上若无其事，但内心还是感到被排斥了，那个滋味不好受。说得轻松点儿，像别的小孩不带你玩儿。说得严重点儿，就是不让你进“革命队伍”了。当时革命的压力那么大，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，要是不革命，就有问题了。

马：你是不是和团组织的人关系不好？

叶：不是，不是个人的理由，我跟谁都没有什么不好。我想

我们班团支部的人就觉得我这个人 not 追求进步，不接近组织。我曾经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，要入团还不容易，不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吗？可是我不写，觉得那种东西假。

马：是啊，你不积极靠拢组织，组织为什么要吸收你？

叶：我们班上有的同学为了入团，写了学毛选的心得日记，放在别人容易看到的地方。当然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上，在底下都议论她。她特别想入团但也没入上。她不是干部子弟，要是干部子弟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机。我知道如果我想入，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的事儿，但是我不想写。

马：当时别人都争着革命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再说你还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。

叶：对，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特别，后来也想过为什么。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家庭环境很平等、民主和宽松，爸爸妈妈从来就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，这养成了我比较能够独立地自由自在地去思想而不会受到斥责，在这点上我终生感激我的父母。新华社那个大院的环境对我的“自由化”倾向也有影响。我觉得每个大院都有自己的文化，比如说军队大院的文化比较尚武。新华社不像一些专门的部委，它是新闻机关，工农兵学商，东西南北中，国际国内，无所不包。在新华社长大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。那个时候院里不分生活区和工作区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。我大大得益于大礼堂和图书馆，它们就像我的课堂一样。如果开了个重要的国际会议，比如日内瓦会议什么的，大礼堂就会有报告，全国知名的人物也会请来讲。小孩也能溜进去听。礼堂每个星期放电影，常放外国电影，也经常有文艺演出。梅兰芳就曾经来演过戏。那是一个从小给我以美的熏陶的地方。新华社图书馆阅览室里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都有，也有外国画报，我是开卷有益，我爸爸妈妈从不干涉。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泡在那里，做完功课就翻报纸杂志看。我想在50和60年代能成长在这样一个

文环境里是很可贵的。

马：真是挺难得的。

叶：即使是在1960年代初反修的时候，也能得到有意思的信息，就看你怎么看。院里曾办过一个苏联摄影展览，目的是让大家看看苏联修成了什么样儿。里面有一张照片，我至今忘不了。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在莫斯科举办完演奏会，几个苏联姑娘趴在台前，很仰慕的样子，台上散着几束鲜花。照片的题目是“莫斯科郊外的傍晚”，很美。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环境的可贵，所以到1966年初，当这个环境受到了威胁时，我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，表示不满。

马：怎么回事？

叶：那年春天新华社开始加强警卫，大院被分成生活区和工作区，工作区有军人站岗，只能凭工作证出入，可能这和“文革”以前的政治形势紧张有关系。图书馆和大礼堂都在工作区，这两处我从小出入的地方一下子就不让我们进了，我对此强烈地反对。我就写了张大字报，对不让小孩进图书馆、大礼堂表示不满，然后拉了我弟弟和我弟弟的一个朋友签了名，署名“三个学生”，晚上贴出去，贴在新华社食堂附近。那一带，过去人们也不时贴一些大字报，像一个新华社的小论坛。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之后有很多小孩知道是我写的，来找我说写得不错。我想我就是为大家写的，你们说不错就好。没想到新华社的思想教育部门把我妈妈找去，让我妈妈注意我的思想。其实那张大字报内容本身真没什么，我就是说图书馆和大礼堂不应该向我们关闭，但是他们说那口气不像小孩写的。记得我那时候特别爱看一个香港记者在《参考消息》上写的文章，口气很轻松，不是板着面孔训人，嬉笑怒骂的。他还有一句名言：“笑谈真理又何妨？”我很喜欢这种不“正统”的文风，就学来了。我想他们觉得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，觉得我比较复杂。



图④ 马笑冬一直希望做一名真正的“红色娘子军”。

马：哇，思想复杂在那时是个很坏的词。

叶：我爸爸当时不在北京，他们就让我妈妈注意我的思想。

马：你父母机关的人还管你的思想？

叶：就是啊，他们居然注意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思想。

马：那你妈妈是怎么和你说的？

叶：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妈妈是怎么说的，反正她没有给我任何压力，我想她是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了一下。印象中我妈妈从来不跟我讲大道理。我妈妈从我上中学起就说“你是名士派”，我想她也感觉到我和时代有点儿格格不入。从小我妈妈就喜欢给我